

客家学研究丛书

Hakka
Studies

民间信仰、客家族群与地域社会

粤东梅州地区的重点研究

宋德剑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COMPREHENSIVE SURVEY REPOR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HENNONGJIA AREA

神农架地区

廖明尧◎主编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信仰、客家族群与地域社会：粤东梅州地区的重点研究/宋德剑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7

(客家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1385 - 5

I. ①民… II. ①宋… III. ①客家人—信仰—民间文化—研究—梅州市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1005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0.625

字 数：192 千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3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以下研究机构经费资助：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梅州市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

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客家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邱国锋

副主编：肖文评 宋德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罗 鑫 周云水 钟晋兰 夏远鸣

总序

客家文化以其语言、民俗、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独特性，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学者的关注。而随着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科学规范的研究行列，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也在呼吁学界能够设立专门的学科并规范客家研究的科学范式。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客家研究的机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用二十五载的岁月，换来了客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率先成为客家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若从质的维度来看，当前的客家研究还面临一系列有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客家学研究的主题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当代客家研究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如何与国内外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诸如此类的疑惑，需要从理论探索、田野实践和学科交叉等层面努力，以理论对话和案例实证作为手段，真正实现跨区域和多学科的协同创新。

一、触前沿：客家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当前的客家学研究主要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范围之内，所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客家研究自然需要敢于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理论。比如，社会学先后出现过福柯的权力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鲍曼的风险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卢曼的系统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①社

^① Pierre Demeulenaere,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会科学研究经常需要涉及的热点议题，在客家研究中同样不可避免，比如社会资本、新阶层、互联网、公共领域、情感与身体、时间与空间、社会转型和世界主义。^①再比如，社会学关于移民研究的推拉理论、人类学对族群研究的认同与边界理论以及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机制，都可以具体应用到客家研究上，并形成理论对话而提升客家研究的高度。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社会科学提倡的建模、机制与话语分析、文化与理论自觉等前沿手段，^②都可以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为客家研究所用。

可以说，客家研究要上升为独具特色的独立学科，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理论对话和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客家学作为一门融会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既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而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又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③不可否认的是，客家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但要形成自身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若离开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的支撑，显然就是痴人说梦。要在这方面取得成绩，则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专注于客家研究的我们似乎有些另类。不过，不管是学者应有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还是人文学科秉持的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激励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触碰前沿理论上不断探索，以积累学科发展所需的坚实理论。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潜下心来大量阅读国内外学术名著，了解前沿理论的学术进路和迁移运用，使客家研究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研究对话的行列。

二、接地气：客家研究的田野工作

学科发展需要理论的建设与支撑，更离不开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

① Jonathan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② James Jaccard and Jacob Jacob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Model-Building Skill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③ 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载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展,而进入客家人生活的区域开展田野工作,借助从书斋到田野再回到书斋的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路径,客家研究才能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能接地气”,才能厚积薄发。

人类学推崇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通过田野方法收集经验材料的主体,客观描述所发现的任何事情并分析发现结果。^①田野工作的目标要界定并收集到自己足以真正控制严格的经验材料,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手段。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客家族群的分布和文化多元特征,决定了客家研究对田野调查的依赖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客家乡村聚落,采用参与观察、个别访谈、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法调查客家民俗节庆、方言、歌谣等,收集有关客家地区民间历史与文化丰富性及多样性的资料。

而在客家文献资料采集方面,田野工作的精神同样适用。一方面,文献资料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客家文化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田野工作既增加了文献资料的来源,又能提供给研究者重要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也使得文献的解读可以更加符合地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譬如,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及民间广泛收集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客家方言等有所记载的正史、地方志、文集、族谱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田野调查需要入村进户,因此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入手,无疑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客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需要点面结合才能形成质量上乘的多点民族志。20世纪9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与广东嘉应大学(2000年改名为嘉应学院)、韶关大学(2000年改名为韶关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赣南师范学院、赣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的系列研究。他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辗转于粤东、闽西、赣南、粤北等地,深入乡镇村落,从事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到2006年,这些田野调查的成果汇集出版了总计30余册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不仅集中地描述客家地区传统民俗与经济,还具体地描述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具体运作及其社会影响。

2013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选择了多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以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展田野作业,要求研究人员采用参与观

^① [挪]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周云水、吴攀龙、陈靖云译:《什么是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67页。



察、深度访谈、文献追踪等方法,对村落居民的源流、宗族、民间信仰、习俗等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形成对乡村聚落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总体认识。在对客家地区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跨区域、跨族群的文化比较研究,揭示客家文化的区域特征,进而梳理客家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

闽粤赣是客家聚居的核心区域,很多风俗习惯都能够找到相似的元素。就每年的元宵习俗而言,江西赣州宁都有添丁炮、石城有灯彩,而到了广东的兴宁和和平县,这一习俗则演变为“响丁”,花灯也成了寄托客家民众淳朴愿望的符号。所以,要弄清楚相似的客家习俗背后有何不同的行动逻辑,就必须用跨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源自田野的事例足以表明田野调查对客家学研究的重要性。

无论是主张客家学学科建设应包括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食疗文化、客家宗教文化、华侨文化等,^①还是认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要由客家学导论、客家民系学、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学、客家民间文学、客家学研究发展史等八个科目为基础来构建,^②客家研究都无法回避研究对象的固有特征——客家人的迁徙流动而导致的文化离散性,所以在田野调查时更强调追踪研究和村落回访^③。只有夯实田野工作的存量,文献资料的采集才可能溢出其增量的效益。

三、求创新:客家研究的学科交叉

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客家研究更是如此,研究者需要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的治学态度——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两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

客家研究要创新,就需要综合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以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方式,形成对客家族群全面的、客观的

① 张应斌:《21 世纪的客家研究——关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嘉应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② 凌双匡:《建立客家学的构想》,《客家大观园》1994 年创刊号。

③ [美] 科塔克著,周云水译:《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57~459 页。

总体认识。

客家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支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多个山区民族的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建立客家学学科，科学地揭示客家族群的个性和特殊性，可以加深和丰富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民俗、方言、音乐等本土素材，形成客家学体系并进一步建构客家学学科，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从而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客家人遍布海内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华侨华人1000余万，每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客属恳亲大会，在全世界华人中具有重要影响。粤东梅州是全国四大侨乡之一，历史遗存颇多，文化积淀深厚，华侨成为影响客家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客家学学科，将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助于华侨华人与侨乡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当前客家学研究成果积淀日益丰厚、客家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情况下，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形成客家学学科理论和方法，构建客家学学科体系，成为目前客家学界非常紧迫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敢啃硬骨头，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目前学科建设条件已初步具备的客家文化学、客家语言文字学、客家音乐学等的论证和编纂，初步建构客家学体系的分支学科。具体而言，客家文化学探讨客家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分析客家族群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客家语言文字学探讨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的特征，展示客家语言文字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客家音乐学探讨客家山歌、汉剧、舞蹈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揭示客家音乐的具体内容和社会意义。

客家族群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研究时既要注意到汉文化、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又要注意到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属性。客家学研究的对象，决定客家学是一门融合历史学、民俗学、方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如何形成跨学科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客家研究必须突破的重要问题。唯有明确客家学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个案研究，广泛收集关于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各种资料，从多角度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

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学研究得天



独厚的地缘优势。1989年，嘉应学院的前身嘉应大学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专门性的校级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以客家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梅州市客家研究院。因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大，2006年11月，客家研究院被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6月，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其又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评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还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成立了“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大会上，客家研究院成功组织“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研讨会，初步奠定了客家研究国际化的基础。2012年12月，客家研究院召开了“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究会”，基本确立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法。另外，1990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坚持每年出版两期《客家研究辑刊》（现已出版45期），不仅刊载具有理论对话和新视角的论文，也为未经雕琢的田野报告提供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自1994年以来，客家研究院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0余项，出版《客家源流探奥》^①等著作50余部，其中邱国锋等的著作《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肖文评的专著《白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③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房学嘉的专著《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深厚的研究成果积淀，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圈交流的能力，这离不开多学科理论对话的实践和田野调查经验的积累。

客家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客家研究在前述立足田野与理论对话

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邱国锋等：《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③ 肖文评：《白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④ 房学嘉：《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俯仰之间”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前行，也是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田调报告、教材、译著、资料整理等，体现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不同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愿意从点滴做起。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外客家学界对客家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嘉应学院校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教授、博士

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邱国锋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二章 客家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其仪式	008
第三章 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	027
第四章 公王信仰与客家地区族群关系 ——以龙源公王为中心	036
第五章 宗族、圩市与神明信仰 ——以五显大帝为中心	067
第六章 风水信仰与祖先崇拜之争 ——客家二次葬习俗形成的文化分析	098
第七章 祖先崇拜与嘉靖礼制改革在客家地区的实践 ——以梅州大埔县湖寮镇蓝氏宗族为中心	106
第八章 庙宇的地理空间分布与社会功能 ——以粤东梅州地区天后信仰为中心	114
第九章 近代中西宗教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五华大田樟村基督教信仰研究	122
第十章 民间信仰与海峡两岸关系 ——以三山国王信仰为中心	135
后 记	155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民间信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可以说，有人类伊始，即有之。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宗教信仰的萌芽。如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象征血液，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观念的表现。中国历史文献典籍中关于信仰民俗的记载内容丰富，浩如烟海。经过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浸染，加之各种民间信仰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风俗、节日等文化载体的互动交流，民间信仰已经发展成为一纷繁复杂的庞大的文化体系。正如杨庆堃所言：“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①可见，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重要切入口。

民间信仰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民间信仰的界定和范畴，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是指普通民众的宗教观念、行为实践与宗教仪式。格如特主张，中国民间信仰（小传统）来自代表官方文化的文本传统（大传统）的民间化。^②古典宗教学研究认为，由于民间信仰没有完整的经典教义，其仪式并不表现为教会的聚集性礼拜（congregations），其象征继承了许多远古的符号，所以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其主张是“多神信仰”、“万物有灵论”、“迷信”和“巫术”的总和，只能与“原始的文化”同列。此外，也有人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文化构成一个“民间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体系。荷兰汉学家格如特根据其在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田野调查材料写成的六卷本专著《中国宗教体系》，主张中国民间信仰体系是一种系统化的宗教。20世纪20—50年代，功能主义风行。由于格如特汉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

① 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②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59~160页。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几乎都同意把中国民间信仰和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但是，在海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中国民间宗教”这一词语被用于指非官方的新教派，以及制度化的传统宗教所衍生的民间散布形态。

总体而言，中国宗教文化体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以儒、道、佛三教为主干的大传统和以信仰因素为主导的民间文化小传统。其中，民间宗教文化包括信仰体系、仪式体系和象征体系，影响着社会上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间信仰是指民间社会所生成或传承的各种信仰与崇拜，民间信仰研究的范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重点是民间社会生活中民众的信仰行为与精神世界。对于官方认定的民间信仰行为，可视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上层社会信仰的首要目的是谋求上天神佑，是企求上天对其权力的认可；民间信仰的首要目的是祈福，是基于生产与生活需求的实际功效，诸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所需等。

中国大陆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当时源于批判的视角，民间信仰成为封建迷信的代名词，研究者带有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许多接受西方科学理性的新派人物把下层民众的迷信看作国家贫弱的根源，把普及教育、革除迷信作为启蒙的一大任务，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周寿昌发表的《论迷信》（《东方杂志》，1921 年第 18 卷第 4 期）。该文对迷信的界说、成因、要素都做了概括，他认为：“在当时，并无哲学上的根据，又与科学得来的结果冲突，像这种东西，都可以叫做迷信。”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本着批判封建迷信思想的目的，伴随中国新民俗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成果。例如，1922 年 2 月《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3 期设立《迷信的研究》专栏，顾颉刚的《妙峰山》（1925 年），《民俗周刊》第 1 期钟敬文的《发刊词》（1928 年），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 年）等。此后由于历史原因，民间信仰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度沉寂。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的兴起，民间信仰研究重新进入学术殿堂，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述有马西沙等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989—1995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六本卷；1993 年段宝林等编撰的《中国民俗大全》（后改名为“中国民俗大典”）大型系列丛书；肖一平等编的《妈祖研究资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年）；林国平、彭文字的《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邓启耀的

《中国巫蛊考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支平的《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王铭铭、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日本渡边欣雄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国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郑振满、陈春声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童恩正的《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阎云翔的《浅议龙的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1期),陈春声的《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郑振满的《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刘铁梁、赵丙祥的《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1997年),张祝平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李秋香的《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马新的《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范正义的《社会转型与民间信仰变迁——泉州个案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仇王军的《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等等。研究者注重以代表性的信仰主体或区域性信仰为研究单位进行研究,以期揭示民间信仰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文化意义。

台湾学术界关于民间信仰研究的代表性著述有刘枝万的《中国民间信仰论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4年),李亦园的《信仰与文化》(巨流图书公司,1978年),郑志明的《中国社会与宗教》(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和《台湾的鸾书》(正一善书出版社,1990年),董芳苑的《认识台湾民间信仰》(长春文化公司,1986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妈祖》、《台湾的祠祀与宗教》(台原出版社,1989年),李丰懋、



王秋桂的《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重要的论文有李亦园的《台湾民俗信仰发展的趋势》（1982年），吕理政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谈台湾民间信仰的几个面目》（1991年），林美蓉的《从祭祀圈看台湾民间信仰的社会面》（1991年）。研究成果尤为注重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面相，研究者力图从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的实践经验来检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概而言之，到目前为止，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有成为显学的趋势。除了宗教学外，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对民间信仰的兴趣与日俱增，民间信仰日益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焦点，其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即民间信仰是否自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二是民间信仰的仪式实践与文化内涵；三是民间信仰在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方法也从历史文献分析解读向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并重转变，“既强调将文献作为田野，以进入和解释当地人的信仰文化和信仰生活的真实的历史；也主张以田野作为文献，即通过观察、参与，适当地运用口述史方法，以探查地方信仰活动各种新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①。在研究取向上，将民间信仰活动置于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民间信仰活动、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文化网络的运作实践，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正如郑振满、陈春声在《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的“导言”中所言：

“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常常相当稳定地保存着在其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通过这一研究去“认识潜伏于普通百姓日常行为之下的有关‘世界观’的看法”；而且这种研究“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闽赣边客家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客家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由于山区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民间信仰较为繁荣的地区。

自1933年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客家民间信仰作为

^① 陈进国：《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11月9日。